

诸葛亮

忠义才艺集于一身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

开科取士，提倡教育，不遗余力；提拔人才，奖励后进，用心良苦；奇正攻守的兵学理论，八阵图的设计，皆为后世兵学名家所推崇。

庞统

南州名士，与诸葛亮齐名

为人朴钝，雅好人伦，南州人士之冠冕，眼光深远，计谋百出，不愧“凤雏”之称。

法正

书香门第，智囊之士

才智之高，堪称当时第一流，凭其智术，辅明主，建功业，承前人之遗志，复兴汉之大业，流传史册。

蒋琬

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

湘乡先贤，宰相之才，有宽容之气度，宽宏之雅量，承前人之遗志，复兴汉之大业，成一代贤名。

费祎

目不忘的才雋青年

汉后期重要政治家，秉性聪慧，读书过目不忘，才智过人，对人推心置腹。

邓芝

明德之后的达人

前汉时期重要人物之一，不但善于外交辞令，且善于处理政治事务，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



蜀漢

風雲人物



惜秋◎著

关羽

忠义千秋的勇将

为人刚正，豪尚义气，以匡扶汉室为己任，然个性好强争胜，有损大将风度。

张飞

智勇兼备的大将

涿郡富商，武侠兼备，勇冠三军，敬爱君子而不恤一般人，乃其取祸之道。

赵云

智勇忠义兼备的常胜将军

能择主而事，忠于职守，处事小心谨慎，终其一生，从无败绩，即在敌众我寡之危急情势下，也能转危为安，反败为胜或全军而退，不愧常胜将军之称。

黄忠

老当益壮建不世功业

冲锋陷阵，勇不可当，斩敌将，定汉中，成不世勋功，享名后世。

王平

识字不过十的蜀籍名将

一介武夫，未受相当教育，识字不多，而事理之明辨甚断，军势之了解甚深，此盖天赋之所致。

姜维

心存侠义与远志才内隽

深解兵意，胆大心细，明辨忠奸，好学不倦，不灰心丧气，即在无可奈何中，仍想方设法达成光复社稷之目的。

K820.26

6



蜀漢風雲人物



惜秋◎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著作权所有:©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禁止以商业用途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散布、销售。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权所有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书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7-07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蜀汉风云人物/惜秋 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7-5633-6756-6

I. 蜀… II. 惜… III. 历史人物-人物研究-中国-蜀汉 IV. K820.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799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395790-103/168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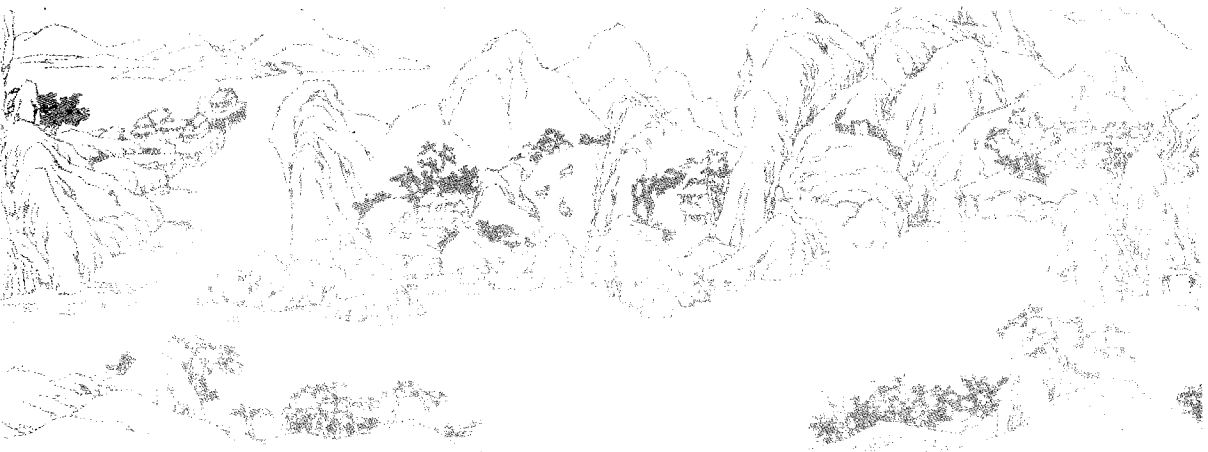
开本:960mm×1380mm 1/32

印张:6.5 字数:165千字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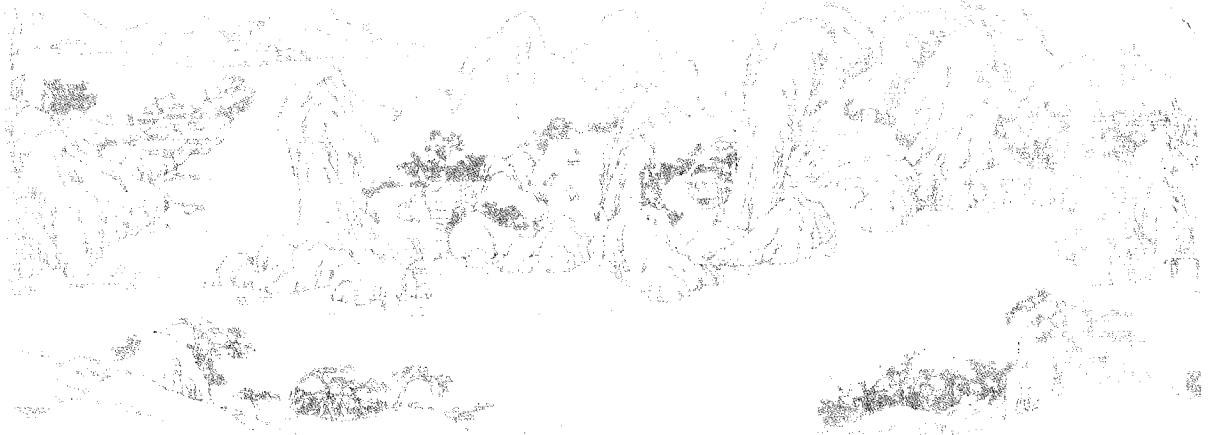
印数:0 001~7 000 定价:2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39—2925659



目 次

诸葛亮	1
关 羽	66
张 飞	92
赵 云	104
庞 统	115
黄忠、法正	123
刘 巴	131
蒋 琬	136
费 祗	143
简雍、糜竺、孙乾	149
董和、董允	155
王 平	159
邓 芝	164
张裔、杨洪	169
马忠、张嶷	175
张 翼	184
姜 维	188



诸葛亮

忠义才艺集于一身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

关于诸葛武侯的传记研究,作者已经写过三次:第一次是在重庆,后两次都在台湾。这三次所写的,都各有一定的目标,而不是整体的研究。在重庆所写的,是针对《大公报》王芸生《诸葛亮新论》所做的辩证。王某指责武侯不懂战略,只注重秦川一路的北伐,不知道培养人才,而且裁抑已有的人才;只爱管小事,而不知政治的大体。他的错误,是断章取义,意在借古讽今。当时驳斥他的谬误者,很有些名作家,但似乎都没有抓住要点。朋友们要我也写一篇,指出其误解或荒谬的地方。因此,在那一篇中,我是专门针对这一方面下笔的。我把《三国志·蜀书》各传的人物,做了一个籍贯的统计,我的结论,是蜀汉一、二流主要人才,无论文武,绝大多数都自外来,大体上都在黄巾起义以后,由于亲故在蜀的关系,进入巴蜀避难;三国鼎立之势既成,局面安定,再没有外来的人才,时间把这些外来的人才逐渐消逝,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便是这一情势之所趋,其实廖化还不是蜀人。反之,武侯在蜀,开科取士,提倡教育,不遗余力。所谓武侯裁抑人才,王芸生指的是废李严与廖立,这两个宝贝,一个是奉命执行不力,而且以诈术施骗;一个是不做实际工作,只是口出大言,月旦人事,破坏政府用人的威信。都是罪有应得,绝非武侯嫉忌人才。反之,武侯在蜀,奖掖真正人才,不胜枚举,如对蒋琬,对费祎,对姜维等,遇有机会,必加誉扬;即第一次北伐,重用马谡,也是由于人才缺乏,奖励后进的用心。



至于只重秦川一路的北伐，我们试看他的隆中对策，分明说：“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是主张两路北伐的，故刘备入蜀，武侯亲率关羽、张飞、赵云等锐师，留驻荆州，是等候将来的北伐机会；但是刘备不能单独定川，不能不乞援于荆州，武侯乃率张飞、赵云等西去增援，留关羽守荆州，关羽之失荆州，为武侯此后北伐只重秦川一路的张本。史实如此，岂可厚诬武侯。王芸生最大的错误，是对蒋琬还屯于涪，大加赞赏，以为涪即涪陵，是蒋琬将向荆州进军的准备；而不知涪乃涪水关，武侯北伐，以攻为守，使敌人疲于奔命，蒋琬还屯于涪，是专重守势，距蜀亡之期不远了。果如王某所说，时荆州已在吴手，蒋琬欲取荆州，势必先与吴战，是蹈刘备的覆辙，何况那时候蜀军，已无甚实力。武侯之注重小事，亦有其苦心，正与刘备结髦忘忧之意相同，后人不解其意，妄加批评。其实，武侯亦何尝以注意小事而误大政！此文发表后，时人同情王芸生之谬说者，为之豁然而悟，人心大快。

作者第二次研究武侯传记，是在阐述我国开疆拓土有贡献的民族伟人。武侯南征，“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对豪酋孟获以七擒七纵之法服之，终得“南人不复反矣”的结果，故不留一兵，不置一官，而南中对蜀军北伐，输送粮饷不绝，这是他的攻心战术之收效。近人解释“不毛”，误作“八莫”，这又是一个大误解。八莫在今缅甸北部的伊洛瓦底江上游，武侯南征，似未至保山以西；而其所取路径，则是渡泸水，即大渡河，首服旄牛国，次经大相岭与小相岭，下建昌谷地而入滇境。大小相岭，本属无名大山，因武侯经此，而有丞相岭之称。其山海拔三千公尺以上，山岭高处常四时积雪，真乃不毛之地。不必以“不毛”与“八莫”之音相近，而作此遐想。

作者第三次研究武侯传记，是为了写一本《中国十大政治家》。武侯是我国历史上的大政治家，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在我这本书中的武侯传记，重点是在武侯的施政绩效，其他部分，只是约略提及而已。

因此，这三次对武侯传记的研究，都是局部性的。在我的撰著计划中，有十本风云人物的传记。这十本风云人物，主要是把乱世中奋斗成功的英雄，予以比较详细的介绍，旨在描写风云人物奋斗成功的史实，鼓励积极的奋斗气氛。作者并不反对文天祥、史可法精神的提倡，他们是仁至而义尽，时代已是气数将尽，不得已而以身殉国，留着与天地常存的正气，为后人取法，是为将来，不是为现在。一般人看到文天祥、史可法奋斗的结果，连生命



都失去,不免有些泄气,故作者代以成功人物的介绍,期望倡导积极的精神。

我这本书的名称是《蜀汉风云人物》,首先要和读者研究的,便是诸葛武侯。也许有人说,武侯努力建立的蜀汉,毕竟也亡了国,对我的宗旨,不尽相符。这里,我要先说明一下,当刘备三顾茅庐时,他还是一个并无立足之地的落魄英雄。但是武侯为他提出先定荆州,东连孙权以共拒曹操,西取巴蜀为根据地,南定南中以安定后方,然后两路出师北伐以兴复汉室的伟大计划,终能逐渐实现,岂非奋斗成功的英雄人物!

姓氏来源与时代背景

大家都知道武侯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别号卧龙或伏龙,是琅玕郡的阳都县人(今山东沂水)。他的始祖,据贾执的《英贤录》是有熊氏,其得姓则始于春秋时代。据左丘明的《世本》:“宋景公有大夫瞻葛祁,其后齐人语讹,以瞻葛为诸葛。”但据韦曜的《吴书》:“诸葛氏,其先为葛氏,本琅玕诸县人(今山东诸城),后徙阳都。阳都先有姓葛者,时人谓之诸葛,因以为氏。”此与应劭《风俗通》所载略合,《风俗通》说:“秦末有葛婴,为陈涉将军,有功而诛,汉文帝追录,封其孙诸县侯,因以为氏焉。”由左丘明之说,诸葛得姓,始于春秋;由应劭之说,其得姓盖在西汉。应劭与韦曜都认为诸葛原为葛姓,殆无可疑。其称卧龙者,因其躬耕之地为卧龙岗,其被称为伏龙者,乃当时一般学人对其才能之称许。《襄阳记》云:

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司马徽字),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伏龙之名,始见于此。《三国演义》谓“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是有所本的。

武侯卒于后主建兴十二年八月,年五十四岁。按建兴十二年,为魏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上推五十四年,为东汉灵帝光和三年,公元180年,正是东汉季世。大家都知道东汉的桓、灵二帝,是愚昧昏庸之君,宠信宦官,



卖官鬻爵，朝政不纲，君子道消，小人道长，政府威信，扫地以尽。况内有十常侍之乱，外则百姓苦于苛虐，怨声载道。武侯四岁的时候，就发生黄巾起义，五岁至九岁，即发生董卓之乱。十二岁，吕布杀董卓，中原大乱，封疆大吏如曹操、袁术等，都割地称雄。十六岁时，兖州牧曹操劫持汉献帝，自称司空，在黄河下游，已具庞大的势力圈。十六岁至二十五岁，曹操攻灭袁术、袁绍兄弟，杀吕布，自领冀州牧，已统一了黄河下游，并率大军南攻荆州。刘备在黄巾起义时已立战功，他虽是汉室宗亲，但其时已流为平民，政治上并无基础，兵力亦极单薄，曾与曹操合作而不见容，曾依附徐州牧陶谦，起义勤王，但被击败，不得已往附刘表，而荆州亦被曹操所攻，大有容身无地之难。曹操之攻荆州，开始于汉献帝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但军行甚迟，时武侯二十三岁。刘备三顾茅庐，访问武侯，则在建安十二年，时武侯二十七岁；正是他最落魄的时候。武侯则自食其力，躬耕于南阳，于世事则是暗中关心而已。

武侯本是琅琊阳都人，他又何以至南阳做村野的农夫？其经过是这样的：原来武侯幼孤，由他的叔父诸葛玄教养长大。他的父亲名珪，曾任太山郡丞，早卒，故依叔父为生。诸葛玄曾被袁术任为豫章太守，携武侯及弟均同住。会袁术败亡，曹操以献帝之名任朱皓为豫章太守，玄乃离职，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乃往依刘表。玄卒以后，武侯遂躬耕自给，不问世事，但与襄阳学人司马徽、庞德公等时有往来，切磋学问，砥砺品德。

武侯躬耕之地，到底是南阳抑襄阳？成为后世当地人士争执的问题。依作者的研究，武侯自撰的《出师表》中，清楚地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他躬耕之地为南阳，应为不易之定论。但是，当时的襄阳是知名的知识分子荟萃之地，因此他不时到襄阳，访问这些学人，这也是不易之定论。武侯和这批知名学人相往来，有下列诸事可证：

其一，习凿齿《汉晋春秋》，所载如下：

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德公襄阳人，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尝造德公，值其沔上（沔为汉水之另一名词）祀先人墓，德操径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从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当来就我，与德公谭，其



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奔走供设。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岁，兄事之，呼作庞公。……德公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诸葛孔明小姊……早卒。……统德公从子也，少未有识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见德操，德操与语，既而叹曰：“德公诚知人，此盛德也。”

其二，《魏略》：

孔明在南阳，同县庞德公有重名，司马徽兄事之。娶孔明小姊（娶字上应有“子山民”字样），夫妻相敬如宾。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其从子统，少时朴钝，惟德公与徽重之，德公尝谓亮为卧龙，统为凤雏，徽为水镜。

由此可知武侯在躬耕之余，常与这批名士往来。桓、灵失政，宦官专权，百姓视政府褒贬如粪土，名士一言，反能增高身价。此风早已形成，如陈蕃、郭太等名士，都是被人争取称许的对象。庞德公望重当时，其所称许的，身价十倍，武侯与庞统等知名度之高，当与德公之称许有密切关系。我们读了上述两段记载，可以理解这些学人的交往，脱略形式，不拘小节，诚足令人向往。

学术基础

武侯是什么家？后人颇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从他信赏必罚，用法严峻这一方面看，称为法家。妄人王芸生则认武侯为法道合抱之流。其实武侯是儒家，早有定论。孔圣文庙的两庑，列首位者即为武侯，此其明证。

依作者的研究，古代儒家，分在朝与在野两派。周公是儒的鼻祖，他的《周官》，是当时体国经野的大法，他是政府的负责行政当局，他非常注重礼。礼的范围甚广，礼教、礼俗、礼制、礼法等，都包括在内。周公固然非常重礼教，那就是以教育来教人为善；但是教而不善的怎样办呢？那就非法律制裁不可。故《周官》中，凡有法令，一定要向民众详细解释，孰者应为，孰者不应



为,但是更重视“不信者刑之”,每一法令之下,必有此语。足证原始儒家是教与刑并重的。

儒家到了孔子,曾任鲁司寇,他以言诡而辩等罪名,诛少正卯,少正卯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伪君子,但孔子诛之,足证孔子对于原始儒家教刑并重的意义,还是身体力行的。但孔子周游列国,不能得志,退而教育弟子,乃专重教人为善。其后的孔门弟子,任公务员者极少,于是专重教人为善,作者称之为在野儒家,当时不为世重。如汉高祖专以侮辱儒家为快事,便是一例。但自叔孙通定朝仪,皇家始知儒家对政治原也有所裨益,逐渐改变观念。

自董仲舒上《天人三策》,儒家在政治上始渐抬头。至武帝而定儒家为一尊,于是儒家的经典,遂成为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籍。武侯生长于东汉之季,浸淫于儒家学说之中,这是必然的。因此,武侯的思想基础,是儒学,更无可疑。汉帝之开始受在野儒家学说影响最深的,当推元帝。元帝为太子时,常引在野儒家之说,向其父宣帝诤谏。宣帝说:“乱天下者必太子也,汉家自有法度,本杂王霸而用之。”所谓王道就是教人为善的仁政,所谓霸道,就是以法律裁制为恶之徒。王霸杂用,也就是周公礼教与礼法并重之原意。

但是,儒家学说到了东汉,逐渐流为注疏派,也就是重于寻章摘句的解释,自马融而至郑玄,注疏更为流行。其法重在死记和背诵。武侯同窗诸名士,如石广元、孟公威、徐元直皆如此学习,但武侯则独观其大略。《魏略》云:

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夕,从容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笑而不答。

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理解下列各点:其一,武侯在建安初,已至荆州;他在荆州,虽然耕种自给,但仍继续研究学问,他所注意的是经世安民之学,不是寻章摘句之学;其二,他身在山林,心寄廊庙,所谓“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他的饰词。这是我国传统学人的本色,正如孟子所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他是在纷乱中,增强自己的学识,以备后日的用世。他的抱膝长啸,啸的是什么?《魏略》并没有说明,但

是从别的资料中,我们理解他长啸的是《梁父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说:

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从这一记载中,我们可以理解下述各点:其一,他好为《梁父吟》;其二,他躬耕南阳,不是隐居,而有澄清世事的大抱负,这段时间,是他充实学力识见的阶段;其三,他的抱负是以管仲、乐毅为榜样,管仲佐齐桓公成霸业,他治齐是悉照《周官》一书中的办法,管仲非法家而是儒家,详见拙著《中国十大政治家》中的《管仲》一文。乐毅佐弱小之燕,联五国之兵,进攻齐国,下七十余城,是一个军事家而兼外交家。由此,足以说明武侯之躬耕陇亩,不是真的过隐居生活,而是修养学术,备供世用。

所谓《梁父吟》,到底是一首怎样的可歌之曲?根据《乐府诗集》谢希逸的《琴论》:“诸葛亮作《梁甫吟》。”又《陈武别传》:“武遂学泰山《梁甫吟》”;又据李勉琴说:“曾子耕泰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梁甫本为山名,在泰山下,当时的《梁父吟》,是思亲葬歌之类,武侯当不歌此。《诸葛亮文集》载有《梁父吟》,是描写晏子用两个桃子除去三个勇士的故事。此歌是否可靠?有问题,原歌云:“步出东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强古冶子。力能拔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这是武侯述志的自度曲,以古调歌之。由此可知,武侯也以晏婴为模范人物,孟子有“晏子以其君(齐景公)显”语,此亦武侯在野时之志也。实际上武侯所读之书,不限于经史,诸子百家,无不揣摩而得其精义。《诸葛亮文集》中有《论诸子》一篇,读之便知。

武侯对于兵法的专攻,曾经下过苦功夫,我们试看《仙鉴》一书中的一段记载:

司马徽谓亮曰:“以君之才,当访名师,益求学问,汝南灵山鄆公攷熟谙韬略,余尝过而请教,如蠡测海,盍往求诸?”引亮至山,拜



玖为师。居期年，奉事惟谨，玖知其虔，始出《三才秘篆》、《兵法陈（同阵）图》、《孤虚相望》诸书，令揣摩研究。百日，玖略审所学，皆能致其奥妙，谓曰：“方今天运五龙，非有神力者不能济弱于斯时也。”亮问五龙之说，酈公曰：“秦汉之时，五龙变现，如嬴秦为白，吕秦为黑，项王为苍，汉高为赤，汉文梦黄龙之瑞，光武膺赤伏之符，故两汉互尚黄赤，及今汉祚欲终，火土垂绝，虽余焰未息，复当流之于西，稟金而王。孙坚修汉诸陵，乘土之德，故狮鬼创业于江左。与火土为仇难者，水也；曹操已定北方，木继水而生，其子有青龙之祥，火袭木而王，其后有二火之讖也。”亮曰：“操为国贼，权为窃命，亮当此乱世，则惟退隐躬耕，养志乐道。”公曰：“不然，抱此材器而不拯救斯民，非仁者之心；然出处以正，刘备汉室之胄，子如一出为辅，则可成立矣。”亮问：“关张辈何如？”公曰：“羽是解梁老龙，飞是涿州玄豹，云乃常山巨蟒，竺乃东海寿麋，其后复有襄阳凤雏，长沙虎母，西凉驹子，天水小龙，皆子之良佐使也。南郡武当山上有二十七峰、三十二岩、二十四涧，峰最高者曰天柱、紫霄。二峰间有异人曰北极教主，有琅书、金简、玉册、灵符。皆六甲秘文，五行道法。吾子仅习兵陈，不喻神通，终为左道所困。”遂引至武当拜见，惟令担柴汲水，采黄精度日。居既久，方授以书，遣下山行世。至灵山，酈公已北回复命，复寻教主，亦不在。……始悟神人指点，自负不凡。司马徽见之，改容曰：“真第一流也。”

上面这一段记载，充满着神秘的气味，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汉代的今文经学家，逐渐流于谶纬五行神秘之说，道教流行，信者亦多，例如淮南王好读仙经，服食练气，以求长生；贤如张子房，晚年竟辟谷学仙。张良之学仙，可能是避汉高祖之诛戮功臣，但亦可见其时道教仙术之流行。我们读这一段文字，应该注意武侯在建安初以后的十余年中，不但访师求友，而且两度访求兵学名师，苦学兵法。他学问之广，心得之深，是具体的事实。

由上所述，可知武侯治学，以儒学为中心，旁及诸子百家与兵学。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修己治人，其步骤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所称的国是封建诸侯，与后世的国家观念不同。武侯自己人格高尚，品行端正，虽汉室已衰，但他仍忠于汉家，其志丝毫不能动摇。儒家为政以养民、



爱民、富民、教民为本，武侯执政以后，完全遵照这些原则施行。不但自己重人格修养，对同僚与子孙，也都本此等原则来期望他们和劝勉他们，试读他的《诫子书》：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太平御览》卷四百五十九）

又《诫外生（甥）书》云：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庸庸，不免于下流矣！（《太平御览》卷四百五十九）

其兄诸葛瑾事东吴，东吴令瑾子恪典主粮谷，武侯忧之，乃与陆逊书云：

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

由此，可知武侯对亲故训诫之忧，实皆夫子自道耳。

对于僚属，武侯也尽了他教导之职，而悉本儒说。如《与张裔书》：“去妇不顾门，妾非不入园。以妇人之性，草莱之情，犹有所耻，想忠壮者意何所之？”（《太平御览》卷九百七十六）如黜来敏云：“将军来敏对上官显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夺荣资与之邪？先帝之无所礼用。后刘子初（刘巴字）选以为太子家令，先帝不忍拒也。后主即位，吾暗于知人，遂复擢为将军祭酒……自谓能以敦厉薄俗，帅之以义。今既不能表退职，使闭门思过。”（《蜀书·来敏传》裴注引）又劝将士勤攻己过云：“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是贼，而不能破，反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如今已后，诸有忠虑于



国，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跷而待矣。”（《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又武侯为丞相，开府，辟蒋琬为东曹掾，琬固辞，因与书曰：“思惟背亲舍德，以殄百姓，众人既不隐于心，实又使远近不解其义。是以君宜显其功举，以明此选之清重也。”（《蜀书·蒋琬传》）孟子说：“禹闻善言则拜”，武侯之于僚属，不但勛以忠义，且冀其“勤攻己过”，都本于儒家之说。又武侯成婚，独娶黄承彦之女，奇丑无比，重德不重貌，亦足说明武侯之修养悉本儒家。

三顾茅庐与定计献策

武侯的修养，在政治上首先运用者是隆中对策。《三国演义》有“徐庶走马荐诸葛”一段，是把史实弄错了。荐诸葛者实为司马徽。而武侯入刘备幕中时，实与徐庶共事。不错，徐庶也是先侍刘备，亦曾向刘备举荐武侯。《魏略》云：“徐庶名福，与同郡石广元相亲爱。初平（献帝初期的年号），中州兵起，乃与韬（广元名）南客荆州，到又与诸葛亮特相善。”《蜀书·诸葛亮传》亦云：“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由是，可知司马徽荐武侯于前，而刘备未暇往访，促成刘备三顾茅庐者，实为徐庶。

刘备既见武侯，乃屏退左右，促膝长谈。刘备问诸葛亮“计将安出”，诸葛乃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曹操势大，不可与争锋，孙权坐拥江东，已历三世，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荆州据汉沔可作根据地；益州险塞，刘璋懦弱，可取为后方基地。“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便是所谓隆中对策，是武侯为刘备开创基业的大政方针，而以兴复汉室为其终极目标，这是出处进退的正道。刘备虽有澄清天下的大志，但他既不懂军事，又不识天下大势，更谈不到具体的实行计划。武侯的一番议论，真是闻所未闻，于是大加赏识，“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如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诸葛亮传》）由此可知刘备之如何重视武侯了。

但是刘备既见诸葛亮以后，即赴新野前线，武侯似乎并未偕行。后来败至樊城，武侯始至军中献策。此在《魏略》的记载中可以证之。《魏略》说：

刘备屯于樊城，亮知荆州次当受敌，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亮乃北（似应为南字）行见备。备与亮非旧，又以其年少，以诸生齿待之。坐集既毕，众宾皆退，而亮独留，备亦不问其欲言。备性好结氈，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图，但结氈而已耶？”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氈而言曰：“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亮遂言曰：“将军度刘镇南（表）孰与曹公？”备曰：“不及。”亮又曰：“将军自度何如也？”备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将军之众，不过三千人，以此待敌，得无非计乎？”备曰：“我亦忧之，当若之何？”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废调，则民心不悦；可语镇南，今国中凡有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可也。”备从其计，故众遂强。由是知亮有英略，乃以上客待之。

由此，可知刘备在三顾茅庐得闻隆中对策，虽十分钦佩，但仍以武侯为年少书生，未予重视；及樊城献策，始知这个青年，不是纸上谈兵的等闲之辈，乃益加重视。但是曹兵南下，刘表忧死，武侯建议刘备攻刘琮以取荆州，而备以“不忍心”却之，这是隆中对策的第一个挫折。

刘备不乘刘表之死而取荆州，也有他的道理。《资治通鉴》卷六十七《汉纪》五十七，有如下的一段：

九月（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操至新野，琮（刘表次子）举州降。……时刘备屯樊，琮不敢告，备久之乃觉，遣所亲问琮，琮令宋忠诣备宣旨。时曹操已在宛，备乃大惊，谓忠曰：“卿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太剧乎！”引刀向忠曰：“今断卿头，不足以解忿，亦耻丈夫临别复杀卿辈。”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议，或劝备攻琮，荆州可得。备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备将众去，过襄阳，驻马呼琮，琮惧，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都归备，备辞表墓，涕泣而去。



我们细读这一段记载,可得而言者,有下列数点:其一,刘备是在公人格与私人格之间,深相矛盾,他重视刘表对他托孤,不攻刘琮取荆州,这是私人格,我们不能加以訾议;但他却有亏于公人格。刘表之托孤,是要刘备辅佐刘琮,保有荆州,这是公人格。刘琮降曹而刘备不知,这一点,他已负刘表之托孤了。他的一哭、一走了之,无法推卸责任,同样不能见刘表于地下的。其二,实际上他有公私两全之计而不知道,而不能行。

何谓公私两全之道?我们试一考察当时主张投降曹操的只有少数荆州将士,只有章陵太守蒯越及东曹掾傅巽等极少数人,刘表所宠信的后妻之弟蔡瑁、外甥张允,手握水军大权,并无具体表示,忠于刘表父子的王威、文聘等都不愿降曹,刘琮左右及荆州人之归向刘备者更多,可知备在荆州,颇得人望;刘琮见刘备惧不能起,足证其对琮颇有威望。如果他在刘琮惧而不起的时候,厚抚之,使仍牧荆州,天下孰有议刘备为不义者乎?刘备既挟刘琮以发号施令,蔡瑁、张允能称兵为乱乎?忠于刘表父子以及善于刘备者,皆来听命,是刘备一举而两全公私人格,且能定荆州大局以告慰刘表于地下,岂不两全?

其三,当前的大事,是定荆州以抗曹操,刘备能定荆州,得荆州仓廩之积以御曹,胜败之数,正未可知,御曹成功,备必威震天下,琮敢不从命?则琮虽仍为荆州牧,亦何殊于刘备自任?即使备效周公辅成王的旧例,还政于琮,琮也不敢违刘备之意也。所谓“乃呼部曲共议,或劝备攻琮”,其中必有武侯的建议,但是刘备既拘小节,成见甚深,诸葛亮也无法深言;足证其时刘备,对武侯尚不能言听计从,武侯亦以交浅不便深言避之,刘备不能有襄樊,遂也不能有江陵。“操以江陵有军实,恐刘备据之,乃释辎重……将精骑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曹操如此重视江陵,而刘备轻弃之,武侯也一筹莫展,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刘备经此大挫折,只好弃辎重与从属,东就关羽、刘琦于夏口,其势益弱,其危益甚。刘备至此,实际上只有东连孙权的一条路好走,这是武侯隆中对策的第二步。

江州会谈与鼎足之形

游说孙权，促成孙、刘联合抗曹，是武侯修养第一次在政治上的表现。

江东孙权，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从黄巾起义开始，孙坚即在江东地区割据为雄，甫成气候而卒，子孙策继之，略加恢弘而亦早卒。孙权继长江东，亦有雄才大略。江东未受黄巾起义，故淮泗间的智能之士，都归于孙权幕中，人才称盛，本文暂不提及。孙权的雄图，北拒曹操，西以荆州为扩充地盘的目标。故曹操南攻荆州，孙权最为关切。荆州如被曹操所占领，则孙权有两面受敌的危机。当时孙权的势力圈，北方尽及巢湖南岸，合肥、寿州均在曹操的掌握；他西方的势力达江州一带为止，江州即今之九江。历代以金陵为帝都者，北必须控制合肥、徐州，西必须控制阳夏、江陵与襄樊，否则形势残缺，安全堪虞。刘表好名而不重实际，故孙权以囊中物视之，及刘表卒，曹操长趋南下拥有襄樊，且又袭据江陵，成为江东之大患。因而在曹操南下之际，鲁肃即向孙权建议，自告奋勇的到荆州去，想做两件事：其一，是探视刘表与刘备的关系，如果彼此融协，则与结盟好，共御曹操；其二，如果他们不融洽，则结好刘备，要他善抚表众，与东吴共拒曹操，备如从命，则天下可图。所以鲁肃之衔命赴荆州，是不怀好意的。

可是，鲁肃之赴荆，却慢了一步。他刚到夏口，操已向荆州；刚到南郡，刘琮已降，刘备则南走当阳。鲁肃乃在当阳与刘备相见。他问刘备的动向，刘备诡称要到苍梧，去投吴巨太守。肃乃游说刘备，不宜远走荒僻，应与拥有六郡、兵精粮足的孙权联好，共治曹操。其实这正是刘备的预定计划，当然乐从鲁肃之议。鲁肃又与诸葛亮攀交情，自称是亮兄诸葛瑾之友，因而定交。刘备乃东至樊口，以便与孙权联合。

曹操既得江陵，顺长江而下，遗书孙权，施以恫吓，实则首当其冲者仍为刘备。武侯乃向刘备进言，“事急矣，请求救于孙将军”。于是诸葛亮奉使东吴，与鲁肃同见孙权于柴桑，展开他舌辩的才能。诸葛亮了解孙权乃发号施令的一方之主，自有其尊严，绝不肯居于人下，故不言孙、刘结合抗曹之议，而先问孙权对曹操之来攻，将作何打算？他用的是激将法。他说：

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江东，刘豫州收众汉南，与曹操共争天下。